

论建国初期九三学社的思想改造

李 宁¹, 王 莹²

(1.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2.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发起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九三学社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群体,重点通过政治学习、社会实践、思想批判三个方面进行了改造。这次思想改造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均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建国初期; 九三学社; 思想改造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14)02-0164-07

新中国成立前后,国际局势十分严峻。1949年艾奇逊发表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明目张胆表示希望通过扶植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权。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是国共之外的、坚持“中间道路和中间立场”的第三种政治势力,美国政界人士认为其“所思、所言、所教”都与他们“颇为一致”,^[1]并努力培养这种“造反精神”,企图使之与国共两党抗衡。坚持“中间道路和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主要有民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数量不在少数。数据表明,在1948年的大学生中间,支持共产党或支持国民党的人都不占多数。^[2]正如《观察》总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储安平曾说的那样:“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3]面对如此形势,中国共产党急需稳固执政党的统治地位,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对此,毛泽东主席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的五评白皮书,要求全国各界批判白皮书的反动本质,希望民主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摒弃对美国的幻想。以民主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民主党派也严辞指责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但由于其特殊的教育及其人生经历,这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表现出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认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为了使他们在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上有一个根本转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服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加快了发动和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步伐。

九三学社前身是“民主科学座谈会”,是抗日战争后期一批进步学者在重庆组织的为发扬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而创建的,倡导“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主动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去,在促进民主政治和团结抗战方面,曾起过积极作用。新

[收稿日期] 2013-12-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10CKS007);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B12020092)

[作者简介] 李宁(1977—),女,河南周口人,河海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学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莹(1984—),女,江苏泰兴人,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基本理论。

中国成立以后,由不少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九三学社,自然也融入了这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不管他们最初对于改造的态度如何,或“主动”或“被动”,在经过政治学习、社会实践、思想批判三个方面的改造过程后,他们的政治观念和学术旨趣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一个重要缩影,也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

政治学习是思想改造的重要形式。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已明确提出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开展“革命的政治教育”。1949年9月,《共同纲领》指出:“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4]同年12月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也提出:在教育工作中必须坚决地正确地执行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1950年3月,全国政协第一次工作会议决定举行每两周一次的各民主党派学习座谈会,并由王昆仑、章乃器、邢石萍三人拟定学习计划方案,得到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充分肯定。同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希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经过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推动和毛泽东讲话的鼓舞,思想改造率先在各民主党派中展开。

学习座谈会是民主党派开展政治教育和参与改造的重要形式。1950年4月20日,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进行学习办法(草案)》,其中提出学习内容主要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方法以自学为主、以小组讨论和报告为辅,通过学习达到政治教育、自我改造、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目的。从1949年9月人民政协开幕到1950年11月止,九三学社通过各种学习座谈会,针对当时重要时事,多次单独发表宣言或声明,主要是抗议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并联合其他民主党派与政协无党派人士,主要围绕庆祝中共建党、建军、国家成立周年纪念等发表宣言或文件。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在1950年12月1日九三

学社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中强调社员与社员之间要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以增进团结,使思想和工作作风不断进步与提高,“用诚实坦白的态度去帮助别人进步”,“要当面去劝导他,善意的批评他”,“别的同志对自己有所批评,也要虚心接受”,“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从旧的社会环境中解放出来”。^[5] 110-111 孟宪章在九三学社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上的宣传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拟定1951年的工作要四组分工:起草组专负宣言、声明;编辑组除编辑社刊外还要编印学术性期刊和丛书;座谈组每两星期要开展时事座谈和学术座谈,以与文教科学界广泛联系;讲演组每两周开展一次学术讲座。^[5] 100

九三学社积极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所举办的双周座谈会及学习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市委统战部所召集的各种会议及学习会,学社代表每次都参加。他们也不放松任何其他各民主党派所举行会议的学习机会,只要有机会参加、有可能参加的,皆有代表参加。思想改造以学习政治理论的座谈会、学习会为主,摒弃亲美崇美的态度,树立紧随共产党的政治理想,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九三学社的社员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年龄差别不大,彼此间能够相互理解,推心置腹地交谈。周培源常参加九三学社组织召集的座谈会、学习会,他认为颇有益于认识的提高。^[6] 以周培源为代表的清华大学行政人员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方针和中央教育部对学校工作的指示”后,与解放区新知识分子比较,批评自己有“从个人目前利益和从保存本单位小集团的出发点考虑问题”的个人主义思想。周培源调任北京大学教职后,在学校领导和党委的科学分析及正确指示下,迸发出“体验到党的领导在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工作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方法的优越性”。^[7] 31

九三学社还举办了诸如招待留学生、学习、讨论的各类集会,向中共中央展示在思想改造期间的学习成果,以此类会议为媒介和窗口,加强与共产党、其他民主党的相互联系及学习。在全国卫生、自然科学、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各种表彰大会中,九三学社皆赠有锦标、锦旗、锦章。1950年3月,中国共产党给九三学社指派了具体的改造对象——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将其作为九三学社分工活动的

范围和重点;1951年教育部成立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机构中,九三学社社员茅以升任委员。

总之,共产党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通过自上而下、从组织到个人的管理机制,让知识分子以马列主义和时事政治作为学习的中心。周培源说:在“三反”运动之前,除了偶然看几本小册子之外,自己没有能够有计划地进行系统的政治学习,1953年《实践论》、《矛盾论》、《中国现代革命史》等著作激发了自己系统学习政治理论的热情。^{[7]32}从前文周培源和茅以升的自我批评文章来看,此时的思想检讨和政治表态还停留在表层的政治认同方面,还没有从学术、思想的深层次上去检讨。

二

除了运用政治学习来启蒙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新政权还将思想改造与社会实践活动结合在一起,让知识分子通过亲身体验,以多种形式加入到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中来,以强化对中国共产党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同。

(一)参加抗美援朝,树立反美亲苏的思想

1950年10月,各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经过反复讨论协商,一致拥护毛泽东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许德珩代表九三学社在决议书上庄严签字。11月4日,九三学社与其他民主党派共同发表《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指出中国抗美援朝是正义的、维护和平的。

1950年12月,九三学社在该社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当时的中心任务,而且是“神圣”的工作。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九三学社各级组织发表有关抗美援朝的宣言、声明、抗议、谈话等文献达60余篇。^{[8]271}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九三学社的其他重要活动还有:1950年9月中旬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九三学社发表了《为反对美帝扩大侵略战争而奋斗》,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随后举办座谈会、讲演会、报告会多次,并在《九三社讯》中发表《抗美援朝问题讨论总结报告》;^[9]围绕肃清美帝的文化侵略势力问题而召开座谈会,并将会议记录在《九三社讯》中全文刊载;^[10]动员学生和社员

子女参军,单北京一地就有30多位社员子女参军参干;^{[8]108}收集了108袋慰问袋。^{[5]103}

九三学社根据本社的特点和任务,宣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认清美国的侵略本质,清理亲美、崇美思想,奠定了亲苏、学苏的基础。全体社员在不同岗位上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其中孙承佩、方亮等社员参加了朝鲜前线的抗战工作,许德珩、梁希、陈明绍等赴朝慰问,方亮等荣获朝中两国颁发的勋章或奖章。不少社员利用出席国际会议和出国访问、讲学的机会,阐述我国抗美援朝的正义立场,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努力。

(二)过好土地改革关,加深对阶级斗争的认识

在1951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观视察土地改革,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号召各阶层人士积极支持土地改革,过好土改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遵从毛泽东的指示,九三学社中央发布了拥护支持土地改革运动的指示和决议,广大社员一方面加强学习有关土地改革的指示文件,一方面以实际行动积极报名参加或参观土地改革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1年,就有100余人参加了土改工作。^{[8]272}据1952年统计,全社有34%的社员先后参加或参观了土改工作,都写了心得体会。^{[8]111}如有社员写道:“农民翻身,阶级对立,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农民所得到的不只是几亩地,而更重要地是进步的政治认识……中国最大多数的人口中的农民这样地当了主人,所以他们从心坎里唱出来: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11]九三社员总结了思想收获,了解了中共土地改革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世界观。

土改一线的所见所闻使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分析自己以前的错误并强调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北京大学博物系教授、九三学社社员胡先晋在《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一文中写道:“要想彻底了解中国,必须先了解中国的农村,要想了解中国的农村,必须先了解它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要想了解它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首先要观察它的社会矛盾。而土改正是暴露这种社会矛盾最明显的机会”,以前土改不成功的原因是“希望不流血地和平地进行土改”;认为

土改不是“单纯的经济斗争”，也是“一个激烈的政治斗争”，需要“遍地进行”，建立起“农民的政权（自然是工农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政权）”，并且认识到斗争策略必须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阶级意识的启发与确定是土改的进行顺利与否的一个决定条件”，农民在土改中将扫清各种旧思想，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翁”。^[12]在具有明显阶级斗争的土改运动中，许多社员开始消除中间路线的思想，知识分子对阶级斗争重要性的认同度大为提高。

（三）协助镇压反革命，认清敌我阶级立场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的反革命分子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反革命气焰嚣张。在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引导下，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分析过去在镇反中发生的“宽大无边”偏向及其思想根源，并号召九三学社社员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协助政府消灭一切反革命分子。

九三学社中央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的决定，各分社积极拥护声明。南京、北京、上海等分社的负责人及一部分社员参加或主持了当地各界民众对反革命案件的审查工作。上海分社于1951年5月13日举行“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座谈会，《九三社讯》刊载了座谈会记录。该座谈会的参加者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社员外，还有高校教授（如复旦大学王恒守、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祁龙威）、其他民主党派党员（如民主建国会辛培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陆印泉）以及上海《大公报》记者陈楚熊、中华书局编辑沈吉苍等社会贤达。座谈会旨在通过与会者陈述所见所闻以提高社员警惕。勾适生举出自己身边的一个学生是特务的例子，批评自己麻痹大意，告诫人们要警惕身边的反革命分子，并指出有的反革命分子有的装进步、有的装落伍。宣移今指出目前的镇反斗争是“另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革命阶级与反革命阶级的斗争”，是“长期性”的，要“站稳阶级立场”，“加强团结”，并提倡“首先要把自己的思想检查一下”。在镇反活动中，九三学社要求知识分子树立认清敌我的阶级立场，教育落后分子，调查嫌疑分子，加强内部团结。^[13]

（四）开展“三反”“五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随着“三反”运动的开展，人们发现贪污分子与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密切关联，两者相互勾结。在这种情况下，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开展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意味着在全国土改基本完成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成为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1年12月31日，九三学社中央向全社发出《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生活和工作作风，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工作准备，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并要求各地分社和全体社员将运动开展情形、典型事例、经验教训及结果详细报告总社。1952年2月九三学社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迭次向全社发出指示文件，具体布置“三反”“五反”措施。九三学社各地分社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支社成立节约检查小组，推行增产节约活动；社员们结合自己的政治任务、业务工作、实际生活，通过坦白检举与批判的方式，订立增产节约计划，改进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彻底改造思想及生活、工作作风。在运动中，有26%的社员担任一定的负责工作，有些社员并担任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8] 114}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知识分子深挖并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根源，使知识分子彻底划清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1952年7月27日，许德珩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从社会制度到各个人的思想行为都有了根本变化……每个同志都受到了相当的教育，社的组织也获得了一定的收获”。^{[8] 114}

政治学习运动从理论上教育了知识分子，社会实践运动使知识分子直接参与到新政权的建设之中。但是，是不是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在经过政治学习和参加新中国的社会实践之后，完全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呢？这不容易确定。九三学社领导人认为，对自己及他人在思想上进行深层的揭露和批判才是决定这次思想改造运动效果

的关键环节。

三

建国前,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有两个极端,要么投身国家政治组织或针砭时弊,要么一心只读圣贤书,专注学术,形成超政治纯学术的思想,这被有些社员称为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的特点。王应睐指出自己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往往从个人兴趣、个人爱好出发,忘记了科学研究工作的目的和为谁服务的问题。经过学习之后,他慢慢知道了“工作不应当是为自己的,而是为国家和人民的”,表示“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14]王际强认为“个人主义”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好名心重,对自己的工作好求表现”:自己经手办的事情总是细心在意,希望落得个好评;自认为不在自己分工项下的事情就很少过问,即使处理也是草率从事,这是追求个人荣誉忽视整体的作风。他把自己对中共的意见归结为个人主义的表现,指出自己的想法是“追求个人荣誉忽视整体的作风、完全从个人的利益和前途出发,是一个可耻的想法”。^[15]陈鹤琴批评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反革命分子可乘的漏洞”。他探究自己的个人主义是出于“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态度不是百分之百心悦诚服,并在职权问题上思想不通”,而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首先是“作客思想”,即“不是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人民革命事业,来对待人民教育事业”,也就是“没有站稳人民立场”;其次是“忽视了党的领导”,才在“职权问题上闹个人主义情绪”,而且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一长制是建立在集体领导原则的基础上,集体领导原则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民主集中制”。^[16]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九三学社的知识分子联系自己的经历、工作,采取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集中批评了超政治纯学术、个人主义、崇美等资产阶级思想,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遵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集体主义观念。

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九三学社中央及北京分社宣传委员会联席会以《动员社员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伟大斗争》为主题,集思广益研究如何推动社员积极参加学术自由讨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王毓铨和孙云铸批判从个人兴趣出发

的研究方法,指出有的研究者忽视历史、自然的客观规律。王毓铨批评胡适叫人研究一个字、一个词,或考证小问题,不研究历史的发展过程,反对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指出这是反历史的历史研究、反唯物史观的治史方法。孙云铸批评有些中国古生物学工作者理论与实际脱节,把室内研究和野外观察分别开来,研究人员很少到野外,而野外人员又很少综合分析。他们都是从个人兴趣出发,只注重小的枝节,而对自然界的规律性却避而不见,注重片面的考据,轻视理论,无形中陷入经验主义泥沼中去。陈方济联系自己的业务,指出不仅在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需要批判学术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农业方面也有这样的需要,并提醒当代的土壤学家们要警惕德国化学家李比西的纯化学观点。^[17]

九三学社中许多人认为,人文学者的研究以理论上的创造为长,需要端正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研究的宗旨;而理工科的专家学者,在开展研究工作时应强调运用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卢于道学习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原理开展脑神经生理学的教学和科研,特别对巴甫洛夫的学说作了深入探索。卢于道说巴甫洛夫是一位伟大的生理学家,他的第二信号学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具有重要意义。他是从事脑神经生理研究的,巴甫洛夫的学说对他的研究工作很有指导意义。^[18]

周培源剖析自己在解放前对共产党的看法是“用了抗日的口号来夺取政权”,“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只想到我国没有飞机大炮如何可以抵得住有近代配备的日本军队的进攻”,使自己“完全替反动派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作辩护,做了反动派的传声筒”。^[19]他阐述了自己的进步,认为超政治纯学术思想在高校改组和院系调整中得到改进:“对祖国人民开始有了感情”,“依靠广大学生群众支持的学生会”,最后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了胜利”。^[7]面对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公布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任务,王应睐认为我国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首先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和大力支持,是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其次有苏联的先进经验以供学习,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工作的方针,科学工作能沿着最合理的途径发展;最后是优越的社会制度使我们有可能有计划地组织全国科学力量,运用集体工作的方式。^[14]随着思想批判的开展,在特定政治条件下,不少知识分子反思、批判自己的

不足,表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了“强大的自信”。

四

从九三学社知识分子在改造过程中的言语和表现来看,这场看似非常“成功”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却给我们留下很多沉思。

经过这次改造运动,九三学社的知识分子大都作了自我检讨和反省,不管是何种原因和动机使然,结果是知识分子原有的“自信”逐渐消失,而代之以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热烈“拥护”。不少昔日广受尊敬的著名人士在社会大众前批评自己的出身、学习、工作等过往经历,承认自己曾有的齷齪思想,给自己的公众形象涂上了浓重的一笔。以设计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世界的茅以升说:由于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缔结了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辩证唯物主义给科学发展以无限广阔的前途,而物质的运动和变化现象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这就坚定了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20]他检讨自己:“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甚至给自己冠名为“剥削者”,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的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21]周培源认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光荣”,能和党的领袖、战士与民主人士的代表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自己感到“万分惭愧”,认为只有“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把工作做好,把政治理论学好,来报答祖国人民对我的殷切期望”。^{[7] 33}他形容自己是“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毒菌”、“丧失了民族自尊心的美帝国主义文化教育贩子”。而事实上,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满腔热血的爱国人士,譬如在“四·一二”事变后,周培源就痛责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22]可是,经过思想的“改造”,他们在政治上高度“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地位之后,却完全忽视或丧失了对自我价值的认可。

许纪霖认为,知识分子的全部自信,是建立在两块基石上的,其一为相信自己是站在知识分子超然的立场,卓尔不群,不私不公,代表公共良知;其二为相信自己孜孜探求的知识是中立、客观的,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神圣意义。^{[23] 196}通过思想改造,知

识分子自信的两块基石成为“原罪”,为了减轻自己的“原罪”,他们在批判自己的同时,积极调转自己原有的欧美学术体系,用政治标准去衡量不具有政治属性的自然科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到人文研究中,这也必然使学术研究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强势影响,阻碍学术研究的百花齐放。他们的文学和学术生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根的一代”。^{[23] 84}由此,思想改造对九三学社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不只是对他们物质生活或肉体生命的影响,更有对其精神层面的影响。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培育出来的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质逐渐丧失。这场运动为1952年的院系调整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自此,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意识形态在思想理论界逐渐获得了主导地位。即使是那些还能保持某些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最终也没能躲过之后“反右”运动的再次“洗涤”。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道德勇气在经过建国初期一系列运动的改造以后,已丧失殆尽。这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特征,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底色”和沉重的历史包袱。

[参 考 文 献]

- [1] 张济顺. 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42.
- [2] 胡素珊. 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100.
- [3] 张竟无. 储安平集[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26.
- [4]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5.
- [5] 九三学社中央文史办公室. 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M].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
- [6] 岳公侠. 周培源传略[J]. 民主与科学,1992(3):6.
- [7] 周培源. 我愿意永远跟着毛主席走[G]//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社员思想改造体会汇编. 九三学社内部资料,1956.
- [8] 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 九三学社简史[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 [9] 卢于道. 抗美援朝问题讨论总结报告[J]. 九三社讯,1951(1):11.
- [10] 九三学社. 彻底肃清美帝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势力(本

- 社反美文化侵略座谈会记录》[J]. 九三社讯, 1951(1):14-20.
- [11] 勾适生. 在上海郊区泗塘乡斗争大会上地主向农民低头了! 投降了! 农民这样地当了主人;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J]. 九三社讯, 1951(4):31.
- [12] 胡先晋. 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J]. 九三社讯, 1951(3):11-15.
- [13] 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座谈会记录: 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J]. 九三社讯, 1951(4):38-39.
- [14] 王应睐. 我对科学必须结合政治的体会[G]//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社员思想改造体会汇编. 九三学社内部资料, 1956:4-5.
- [15] 王际强. 从教学改革实践中改造思想[G]//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社员思想改造体会汇编. 九三学社内部资料, 1956:7-8.
- [16] 陈鹤琴. 我划清了敌我界限, 认清了集体领导原则, 批判了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G]//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社员思想改造体会汇编. 九三学社内部资料, 1956:55-53.
- [17] 动员社员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伟大斗争(中央及北京分社宣传学习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情况报道)[J]. 九三社讯, 1955(1,2):41.
- [18] 高景仰. 卢于道与九三学社[G]//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上海九三学社专辑.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2007:73.
- [19] 周培源. 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G]// 光明日报社. 思想改造文选: 第四集. 光明日报社, 1952:40.
- [20] 茅以升. 顽强地、愉快地进行自我改造[G]//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社员思想改造体会汇编. 九三学社内部资料, 1956:37.
- [21] 崔晓麟. 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183.
- [22] 岳公侠. 周培源传略[J]. 民主与科学, 1992(1):20.
- [23] 许纪霖.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On the Ideological Reformation of Jiusan Society at the Early Stag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 Ning¹, WANG Ying²

(1. School of Marxism, He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serious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t the early stag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aunched the ideological reformation movement for the intellectuals. As an important intellectual group, Jiusan Society reformed itself through political study, social practice and ideological criticism during the movement. The reformation had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influence on both the mental attitude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ultural advancement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Early stage of PRC, Jiusan Society, ideological reformation

[责任编辑 刘文俊]